

哈代战争诗文学现代性研究

徐勤良, 黄清贵^①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外语系, 福建 福清 350300)

[摘要] 哈代的战争诗歌创作基于现代战事这一人类文明的阵痛,是哈代对现代主义诗歌的一大贡献。人在战争废墟中和面对人类文明浩劫时的异化感,强大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新国际爱国主义阐释,以及信仰危机影响下对人类文明的启示录式焦虑,成为哈代战争诗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立足点和突破口。

[关键词] 哈代; 战争诗; 现代性; 异化; 启示录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6-0125-04

哈代是英国文学从维多利亚时代向现代主义阶段转变过程中的一位重要诗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他的诗歌独树一帜,并与其“以过去反观现在”的独特诗学一起被载入英国文学伟大传统^{[1]24}。与维多利亚时期大多数诗人不同,哈代与现代主义诗人们有共同的经历:现代战事,即“一战”;同时,哈代与现代诗人一起见证了“一战”带来的个人和社会的心理阵痛。哈代战争诗创作主要发生在20世纪,对现代战事的诗歌见证反映了他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从满足自我的诗歌中走出来,与社会紧密相连,应对战争的野蛮现实^[2]。

约翰·保罗·瑞克萊姆对哈代诗歌进行了现代性特点的分析,其中包括反映自然和浪漫主义态度的诗,战争诗,悼亡诗和明显运用消极性语言的诗等,并指出现代性自始至终存在于哈代的诗歌中^{[3] 204-223}。国内对哈代诗歌的译介从20世纪初发端,而研究则兴起于20世纪八十年代,真正有可观性研究成果出现是在本世纪伊始,总体而言,与哈代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相比较,其诗歌研究则相对缺乏。在哈代诗歌特别是其战争诗歌的现代性研究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

一 异化现象

总体观之,在哈代的战争诗中,整个世界已经变成混乱的“碎片”组合,而不是维多利亚时期,强大英帝国统治下所呈现出来的有序稳定局面。这与20世纪到来,新生力量异军突起,大国地位不断更

迭等世界多元化发展趋势不谋而合。在《论阿尔及利亚人的驱逐》一诗中,哈代这样说道:

他们的火车上没有竖琴,
那疯狂的敌人
把他们撕成碎片
在毁掉车顶下的齿轮中,
在冒烟的车尾^{①541}

这里,炮声取代了“竖琴”的乐声,将人和世界化为“碎片”,在如此世界里,人作为主体,已经不再是自由的,而是被客体物化。

《鼓手霍吉》是体现哈代对战争“异化”特点的典型案例。首先,“物化是一个哲学概念,在异化语境里,指人为那种非人的、异己的力量所驾驭,丧失了他的自我、他的人的本质,而变成非人,变成物”^[4]。诗中,霍吉因为战争而被弃置于非洲荒野,无棺收敛。四周皆是陌生的环境,“草原”,“异乡的星座”(foreign constellations),“陌生的星”(strange stars)。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霍吉开始追问存在的意义,但是他最终没有知道(never knew)。陌生的环境带给霍吉孤独和恐惧,最后,霍吉被异质吞没:

未知荒原一份子
霍吉永驻此地
胸膛头颅,生自北方家乡
长成南方某棵树
陌生星座统治

[收稿日期] 2013-09-12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哈代战争诗歌研究”资助(编号:2012C058);福建省教育厅B类项目“哈代战争诗歌研究”资助(编号:JBS10273)

[作者简介] 徐勤良(1983-),男,山东淄博人,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外语系讲师。

^①福建师大福清分校教授。

他的星空不尽^{①91}

大自然完全失去了浪漫主义者笔下的亲切感和可依托感,不再令人向往,没有给人以融合其中的想象。北方的霍吉长成了南方的树,在此过程中,霍吉因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和可以定义自己身份的时空条件而被物化。霍吉由此产生的恐惧比对死亡的恐惧还要大,那是一种失去一切实质的恐惧,远离家园,没有重返英吉利的希望。

其次,“非融合性”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大特点^{[5]15}。“霍吉”(Hodge)一词是英格兰的方言词汇,让人联想起英国淳朴的农业劳动者。诗中提到霍吉来自维塞克斯,“维塞克斯”一词在这里出现足以证明哈代诗歌创作的技术性,可谓独具匠心。“事实上,维塞克斯已经开始意味着哈代小说和诗歌所体现出的整个文化——绝对农业化的和前工业化的”^{[3]19}。作为哈代作品建构出来的一个文化符号,“维塞克斯”是英国本土文化传统的代表,给予了霍吉以英国属性。霍吉与维塞克斯的分离表明他在异域被迫失去了继续与英国国民属性相融合的文化背景。诗中所使用的许多表示大自然风貌的词语如“veldt”(草原或平原),“kopje”(小山),“Karoo”(高原)等都是南非荷兰语词汇,是非洲方言的一部分。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哈代想通过运用语言的变化来告诫人们战争的结果会造成国民文化身份的变质。语言解构了文化身份认同,诗中的人物在由非洲方言建构出来的陌生荒野中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而无法与其融合。物理上的分离产生了文化上的割裂,导致了霍吉自身的文化异化。

另外,“霍吉”的基本意思是“大众”,用于此处扩展了诗的含义,意指战争所带来的人的物化现象并不是只对于诗中的鼓手霍吉而言的,而是对于所有士兵而言的。这一词语的使用同样使自我身份消解变得更加明确:一方面“霍吉”作为一名鼓手名字出现,另一方面“霍吉”又作为群体的整体概念出现。诗歌语词的双重性功能的运用在语言上消解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个性化认同,呈现出“反自我”的现代主义命题特征。

《亡魂》一诗与《霍吉鼓手》有异曲同工之妙。战士的魂灵被阻隔在了千里之外,被异质的环境所吞噬。他们渴望回家的急切心情与无情的时空阻隔形成无法逾越的异化张力。

我听到他们说‘回家!’,而我认识他们

皆因为仆倒的灵魂

在大地的低端边缘

在他们战斗的摩羯座下,

我惶恐的走近,紧跟着他们

摒住了自己的呼吸^{①93}。

在空旷的星空下,他们喊出了回家的呼声。在这些诗歌中,士兵的灵魂被放逐的命运跃然纸上,造就了无根式的现代主义焦虑。

异化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作为客体的物有了人的特点。意象主义的奠基人庞德、H·D和艾灵顿所提倡的现代主义的首要特点便是,“对无论主观还是客观的物进行直接处理”^{[5]98}。这一点与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是相通的,诗歌创作中把情感和思想放置在作为对象的物上。在现代主义审美视野中,作为“客观对应物”的自然不再单纯是浪漫主义诗歌中诗人歌颂的对象,自然成为反映人类生存状况的载体。在哈代的战争诗中,哈代常常取大自然中的事物作为创作的对象,与其直接对话,进行相互交流,从而形成一种可逆性关系。大自然有了与诗人一样的人的意识,帮助诗人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在《写作中抬头高看》一诗中,叙述者看到天上的月亮正在注视着自己,好像“全神贯注于我的写作”,于是,他不禁问了一句,“你在干什么呢?”此时,月亮说话了:

噢,我一直打量池塘和坑洞

还有附近的水沟

找寻垂死灵魂的躯体

他已把生命之光熄灭

你能听到他狂躁的言语吗?

是为子而悲恸

他在残酷战场被杀

尽管没伤任何人

现在我好奇的看进

智慧灵光者的头脑

他想写一本书

在如此世界里^{①551}。

哈代让自然开口,说出了自己想说的事情:战争的残酷让世界堕落为拥有垂死灵魂的躯体。书籍所象征的文明仿佛已经拯救不了如此堕落的世界。哈代在自然界中找到了月亮作为抒情和叙述的对应物,完成了对战争的间接评价。

二 爱国主义新解

“右翼爱国主义,军阀男权主义和‘本土爱国主义’毋庸置疑地在十九世纪末的爱国思维中占统治地位”,丁宁生的爱国主义深深打上了“激情的英国主义”烙印,凯普林认为战争是统一的源泉,凯普林的崇拜者W·E·亨雷进一步指出只有战争可以拯救英格兰^{[6]263-273}。

与同时代骚动的帝国爱国主义诗人作品不同,

哈代的战争诗更加透露出平静和哲思的精神,表现出对主流爱国思潮的反动倾向。在哈代眼里,本是朋友的英国和德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哈代“走在乡土气息浓厚的维塞克斯巷陌”,听到了古老的德语语词“Thu bist”,“Er war”,“Ich woll”,“Er sholl”,诗人认为两国人民是“语言上的近亲”(kin folk kin tongued)^{①542}。在《他的国》一诗中,哈代更是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他战争与和平上的一贯主张,“除非爱国主义从过去的险隘意义(仍被 Junkers and Jingoists 所持有)中走出,从而延伸到整个世界,和平事业将一事无成”^{[7]375}。

旅行从家乡出发
穿越了南部海洋
发现成群的和零星的人们
劳作,受苦,在他每寸土地
如同我在自己的土地所经历

.....

我问自己:“我该与谁作战
我又不得不怕谁
削弱谁,打倒谁,鄙视谁
我的国家好似在我视线里
是我一路走过的任何地方。”^{①539}

“如果爱国主义确实是一种美德,它不可能意味着对我们国家的独有忠诚。”^{[6]260}在哈代看来,人性异质意义上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全世界是个整体,“另外,异质(foreignness)情感——如果这种比较意义确实在修辞上是必要的话——只依附于其它星球和它们的居民身上,如果有的话。”^{[7]375}而这一思想并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这也是导致战争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差异性的方法的原因之一。战争导致了大量亡魂的出现,哈代继续在虚拟的时空里探讨自己对所谓“爱国主义”的理解。哈代看到“士兵困惑的亡魂在风中呻吟”^{①90},这些士兵因为战死而失去了物质性的框架和形态,并没有去往一个固定的地点或国家,而是面向自然之风,奏响悲鸣。“亡魂的视野不再是局部的;对亡魂而言,所有国家即是一体;亡魂的国家不再有海洋为界,而是与地球本身的延伸同在,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包含宇宙中所有可居住的星球。”^[8]哈代借用亡魂的无根性特点表达出自己地球村的理念。

哈代基于人类作为栖居于地球的生态整体所阐发的深层生态爱国主义思想是一种积极的新国际和平主义思想。这一思想生长在维多利亚帝国主义的废墟之上,具有突出的现代性。同时,这一点与现代主义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反战小说《三个旧

金币》所持的反战思想遥相呼应。伍尔夫从女性爱国主义出发,提出了女性主义观照下关于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即“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9]。伍尔夫要建立的是一个女性的反战的“外部者”社会(Outsider's Society),在这个社会里,其成员拒绝加盟男权军阀主义主宰下的民族主义国家^{[6]255}。

三 信仰危机

维多利亚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传统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瑟·查尔斯·雷耶尔的地理和化石大发现与圣经创世的叙述相悖。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于1859年的《物种起源》和1871年的《人的进化》提出了通过自然选择进行的进化理论。达尔文所强调的进化论中的选择性与宇宙有一个智能的和万能的创始者设计的基督教信仰是相冲突的。“面对科学的和历史的发现,诸如…乔治·艾略特…和哈代等维多利亚人经历了信仰危机,并导致了他们的不可知论和正义无神论。”^{[3]55}

《海峡炮声》一诗中,上帝不再像制度化的宗教的主宰者,转而成为战争的鼓吹者。诗歌共分为9节。前两节交代了诗歌的背景,“夜晚没有留意,大炮,/震撼了我们躺着的棺槨”,惊醒了野狗、老鼠和牛群,甚至是坟墓里的蛆虫。在“我们”怀疑是否是上帝的审判日到来时,上帝站出来告诉我们,不是审判日,是军事演习,各国军备竞赛,把“红红战火烧得更红”;这时,上帝戏剧性的向世人宣称:

哈,哈!它将会是更热
当我吹起战争号角(若我
确实那样做了;因为你们
人类仅需要永远安息)^{①305}

上帝不仅袖手旁观,没有去制止战争,而且还在肆无忌惮地大笑;在哈代看来,战争中失去理智的不仅是人类,上帝同样变得疯狂。没有值得信仰的上帝的世界成了战火纷飞的混乱之地。“上帝疯狂”的意象与尼采的哲学思想密不可分。现代主义思潮的领航人尼采声称“上帝死了;不过,基于人们的生活方式来看,空穴可能会存在几千年,上帝的影子显现”^[10]。哈代是尼采较早读者之一,声称“我一直打心底里赞同[尼采]的很多说法”^{[1]123}。在哈代的诗歌里,上帝以疯狂的姿态展现出来。此时,诗歌的第7、8节告诉我们,人们已经不再信仰上帝,宁愿去抽烟喝酒,享受物质生活,充分证明人们在没有信仰的时代的时代的精神颓废。

诗歌的最后一节是整首诗歌的升华,是哈代诗歌成熟的象征,诗人成功运用了其在小说中的经典技巧,

将现在和过去,近距离和远距离交织起来,使得时间里包含了空间的概念,空间里同样透露出时间的范畴:

再一次,枪声惊扰了当下

备战疯起直至仇恨

直到斯图亚特塔,

凯姆雷特,和星光下的巨石阵^{①306}。

空间上,诗歌的聚焦点由海峡转移到了岛内远处的塔楼和文化古迹,那是英国乃至世界文明的象征;时间上,诗歌由当下回到了文化遗迹所代表的人类原始时代。在一个缺乏信仰指引的世界里,当下的炮声正在威胁人类自始以来积淀下的文明。哈代在此表现出了面对战争时的强烈的文明焦虑。

哈代曾经用“预言性”一词来描述自己的此首诗歌。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在橄榄树上回答了信徒们关于基督再临和世界末日的问题,基督降临前的世界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11]不难看出,哈代在《海峡炮声》中所展现的上帝降临前世界的混乱和仓惶与耶稣预示世界末日时的描述相仿,这种把《圣经》中的启示录模式和战争相联系的诗歌模式是哈代把对基督教的辩证认识与对现实问题的悲剧性洞察相结合的结果,因此,泰勒称“此诗是一类新的天启式战争诗”^{[1]122}。哈代的预言已经被“一战”所证实,此诗的意义同时超越了预言“一战”的范围,哈代由此表达了自己对战争阴影笼罩下的世界濒临毁灭的预示。战争是哈代关注人类文明的手段,关键点在于哈代对信仰危机下人类文明所变现出的颓废表示担忧。毕竟,在诗歌的最后一节,当人们失去信仰之后,“备战”才转化为“仇恨”的。“现代主义作家往往寻觅预言的破坏力量”,哈代凭对战争后果的预言和文化焦虑,可跻身于现代主义诗人的行列^{[5]100}。

A Study on Literary Modernism Traits of Thomas Hardy's War Poetry

XU Qin-liang, HUANG Qing-gui

(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qing 3503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liferation of Thomas Hardy's war poetry is on the basis of trauma deriving from the modern war. It is among Hardy'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modern poetry. The modernity of Hardy's war poetry prominently stands on the depersonalization of the human beings in the debris of the war and devastation of the civilization, the revealing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patriotism separated from the stunt imperialism ideology, and apocalyptic exhaustion on the civilization in the shadow of the decline of faith on the God.

Key words: Thomas Hardy; war poetry; modernity; alienation; apocalypse

哈代的诗歌创作和出版处在英国从维多利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当中,从而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哈代的战争诗歌创作基于现代战事这一人类文明的阵痛,是哈代对现代主义诗歌的一大贡献。

注释:

本文中所有诗歌引文均由作者翻译。

① Hardy, Thomas. Thomas Hardy: the Complete Poems. Ed. Gibson, James. London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参考文献]

- [1] Taylor Dennis. Hardy's Poetry: 1860-1928 [M].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9.
- [2] Pinion F B. A Hardy Companion [M]. Macmillan: London and Basingstoke, 1984: 366.
- [3] Kramer Dal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mas Hard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4] 杜宁. 物化意象与审美经验——浅析现代主义诗歌中的异化表现 [J]. 甘肃社会科学, 1997, (1): 59-61.
- [5] Childs Peter. Modernism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6] Bristow Joseph.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ctorian Poet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7] Hardy Florence Emily. The Life of Thomas Hardy: 1840-1928 [M].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62.
- [8] Hardy Thomas. "A Christmas Ghost-story" in Thomas Hardy's Personal Writing [M]. Harold Orel. London: Macmillan, 1966: 201.
- [9] Virginia Woolf. Three Guineas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8: 142.
- [10] Levenson Michae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ism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8.
- [11] 马太福音 24:6-7, 29-30. 转引自 [美] 利兰·莱肯. 圣经文学导论 [M]. 黄宗英,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32.